

K870.6
201110
1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 敦煌西域藏文文獻

(1)

ILO.Tib.J.VOL.1—6

主編

金雅聲 趙德安 沙木

編纂

西北民族大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英國國家圖書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10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1/
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編纂。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25-5774-5
I. ①英… II. ①西… ②上… ③英… III. 敦煌學—文獻—藏語 IV. ①K87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230156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資助

英國國家圖書館底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圖版版權 ©英國國家圖書館

文本版權 ©西北民族大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

དྲସ୍ତାନ୍

ହଦ୍ୟାନ୍ତିରକଦମ୍ବଏଣାକର୍ତ୍ତପଦ୍ମଗୁରୁଷି
ଫ୍ରାନ୍କ୍ରିଷ୍ଣାରୂପାନ୍ତର୍ଦେଶୀଅକ୍ଷରମଣିଶ୍ଵରମଣ
ମନ୍ଦରମାନ୍ତର୍ମଣାନ୍ତର୍ମଣାନ୍ତର୍ମଣା
©କ୍ରୂପାନ୍ତର୍ମଣାନ୍ତର୍ମଣା
©ହଦ୍ୟାନ୍ତିରକଦମ୍ବଗୁରୁଷି
ଫ୍ରାନ୍କ୍ରିଷ୍ଣାରୂପାନ୍ତର୍ଦେଶୀଅକ୍ଷରମଣିଶ୍ଵରମଣ

Plates Copyright

© The British Library

Texts Copyright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 ①

編 纂

西北民族大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英國國家圖書館

出 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號

郵編 200020 傳真 (86-21) 64339287

網址：www.guji.com.cn

電子郵件：guji1@guji.com.cn

易文網：www.ewen.cc

印 刷

上海麗佳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787×1092 1/8 印張：47.5 插頁：40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1—150

ISBN 978-7-5325-5774-5/K.1347

定價：2200.00 元

ଦ୍ୱିତୀୟ କୁଳାଶ ତ୍ରୈନ ଦ୍ୱାରା ପର୍ମିଟ ଦ୍ୱାରା ଦେଇ
ହୁଏ ହିନ୍ଦୁ ଦନ୍ତ କୁଳାଶ ଗ୍ରୁପ ଡିପାର୍ଟମେଣ୍ଟ

(1)

ILO.Tib.J.VOL.1—6

ଶତାଶ୍ଵିଷା
ତୈର୍ଯ୍ୟାନ୍ତିର୍ଯ୍ୟା ପାଦାନ୍ତିର୍ଯ୍ୟା ପିଲାନ୍ତିର୍ଯ୍ୟା

ଶତାଶ୍ଵିଷା
ତୈର୍ଯ୍ୟାନ୍ତିର୍ଯ୍ୟା ପାଦାନ୍ତିର୍ଯ୍ୟା ପିଲାନ୍ତିର୍ଯ୍ୟା
ହନ୍ତିର୍ଯ୍ୟା ହନ୍ତିର୍ଯ୍ୟା ହନ୍ତିର୍ଯ୍ୟା
ଦ୍ୱିତୀୟ କୁଳାଶ ତ୍ରୈନ ଦ୍ୱାରା ପର୍ମିଟ ଦ୍ୱାରା

ହନ୍ତିର୍ଯ୍ୟା ହନ୍ତିର୍ଯ୍ୟା
୨୦୨୦ ଅକ୍ଟୋବର ୨୦୨୦

ଶ୍ରୀମଦ୍ଭଗବତ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ଶ୍ରୀକୃତ୍ତିଷ୍ଠାନି

TIBETAN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AND OTHER CENTRAL ASI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1)

ILO.Tib.J.VOL.1—6

EDITORS IN CHIEF

Jin Yasheng Zhao De'an Sam van Schaik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10

SUPERVISORS

Ma Jingquan Wang Xingkang

CONSULTANTS

Wang Yao Dorzhigdongdrugsnyemsblo Chen Jian Hua Kan (China)

Frances Wood Burkhard Quessel (British)

EDITORS IN CHIEF

Jin Yasheng Zhao De'an (China)

Sam van Schaik (British)

VICE EDITORS IN CHIEF

Tshering Shu Xihong Skalbzangthogsmed Mthababkrashisdonvgrub Fu Xianzhan

EDITORS IN CHARGE

Lü Ruifeng

COVER DESIGNERS

Li Yefang

序 言

金雅聲 趙德安 束錫紅

1900年，當整個中國的目光都彙聚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皇城的時候，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藏經洞已經悄然開啓，數萬件珍貴的古代文獻和藝術品結束了千年沉睡，在喧囂的亂世中甦醒，重新啓動了歷史悠遠的回憶。此後，到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首先捆載了藏經洞的資料，然後是1908年法國的伯希和、1911年日本的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的奧登堡，等等。他們在獲取了大量漢文文獻、繪畫、雕塑的同時，也得到了大量珍貴的藏文文獻。在此前後，英國斯坦因、俄國奧登堡、馬洛夫等，還在新疆（古代西域）的古代遺址發掘、采集了其他一些古藏文簡牘、寫本資料。

自敦煌、新疆流散的古藏文文獻，在英國，首先是分藏於大英博物館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最終併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和印度事務部；法國藏品一直保管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俄國部分藏於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而日本所藏則比較稀少和分散。遺存國內的敦煌古藏文文獻流散、收藏情況，基本和敦煌漢文文獻的命運相似，現集中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和甘肅各地。

一、獲取和收藏情況

以敦煌藏經洞所藏為主體，以及新疆、甘肅等地的古藏文文獻的獲取、收藏情況大體如下：

流失國外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獻（約8413號）

1.英國國家圖書館（約3500號）

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中國藏文文獻，主要出自敦煌藏經洞和新疆米蘭、麻扎塔格三處，是最具研究價值的藏品之一。

2.法國國家圖書館（約4450號）

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主要是伯希和1908年從敦煌藏經洞獲取的，包括漢文文獻約4038號，藏文文獻4450號，¹還有其他粟特、龜茲、回鶻、西夏文文獻等。文獻一部分是來自藏經洞，即8~10世紀寫本；另部分來自敦煌北區石窟，約為11~13世紀寫本。

3.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216+57+120號）

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藏藏文文獻，根據亞歷山大·卓林（Alexander V.Zorin）的調查，到1975年為止，總量達到20500件，其中大多數來自西伯利亞、蒙古、北京、拉薩、安多地區。²

敦煌藏文文獻則是奧登堡考察隊收集的。1991年出版薩維斯基編著的《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錄》，³包括214件寫本。其中《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0件；中亞豎體婆羅迷文字音表1件，不知名佛

經1件。⁴其中保留了不少題記，包括97個抄經人和62個校對者的名單。

1914年6月15日，學者馬洛夫購買了57件小木簡，上有藏文題字。這些木簡出自羅布泊附近的米蘭藏人邊塞。

東方寫本部藏文藏品最後一個構成是來自科茲洛夫從黑水城購買的藏文寫本和木版印本，是所有藏文藏品中最重要的部分，約120件。⁵

4.日本龍谷大學（70號）

龍谷大學圖書館編號6001—6070，“主要是藏文文書、佛典、八思巴字文書及藏文字母拼寫的梵文佛典”。⁶

留存國內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獻（9821號）

5.中國國家圖書館（6378號）

據該館“國際敦煌項目IDP”網站公布，擁有藏文文獻6378號，其中已經數字化的1142號。對於其來源和內容則缺少進一步的介紹。⁷黃維忠“據《國家圖書館藏文敦煌遺書目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單獨編號的共計291件（卷），另有29件（卷）背面有藏文文獻。單獨編號的291件藏文文獻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為‘大谷收集品’，計209件，收錄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24—126冊中；其餘82件為後期收購或由社會人士私人收藏者捐贈給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其中有16件為殘片”。⁸網站公布和目錄中公布的差距甚遠，應當說，網站公布的可能是屬於“國際敦煌項目”範圍內的全部館藏，而目錄公布的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敦煌遺書》中收錄的藏文文獻。

6.甘肅各地收藏（3410件）

藤枝晃於1966年發表《敦煌寫本概述》，追蹤了藏經洞流出的其餘敦煌藏文寫本。他寫道：“直到1919年，甘肅地方官府聽到有一遊客買到了很多藏文佛教經典後，便派手下的督察員考察深入實地進行查驗。督察員在那座三層建築南側的佛窟中，找到了94捆重約405斤的藏文卷軸寫本，以及重1744斤的11套夾在木板中的紙本。他留下了90捆，並且把3捆卷軸本和10套貝葉經遷移到敦煌的一所學校，只將1捆卷軸和1套貝葉經帶往蘭州，保存在省圖書館中。這裏再強調的一點是，敦煌留存寫本的重量可能要超過1噸，毫無疑問要超過任何其他各處的藏品數量。”⁹

1978年，黃文煥發表了甘肅省藏敦煌吐蕃文文獻的調查結果，¹⁰統計甘肅各地總藏量達到10000件之多。¹¹

根據2004年以來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的調查，甘肅省各地收藏敦煌藏文文獻共計3410件。¹²也許是敦煌研究院調查範圍僅限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或其他原因，其最終統計數字和黃文煥的調查差距較大，和藤枝晃認為的僅在敦煌就有“一噸以上”的差距更大。由此可以推斷，除了損壞以外，還有不少流散於民間或者轉移到其他公私藏家。

7.臺北“中央圖書館”（5號）

其中《大乘無量壽宗要經》4件和敦煌地區“寅年”藏文帳目1件。¹³

8.國內其他散藏（28件）

根據黃維忠調查，國內還有上海博物館2件，北京大學圖書館3件，天津市藝術博物館6件，上海圖書館8件，浙江省博物館6件，中國書店3件。以上是根據已經出版的數量統計。¹⁴

綜上所述，按照比較保守的統計，敦煌、西域傳世的吐蕃文獻，總量約為18234件，其中國外部分8413件，國內部分9821件。而由於各種原因藏之名山不為人知的實際總量將大大超過這個數字。這樣，我們就大體了解，吐蕃時期遺留的藏文寫本大致有20000件以上。

關於藏品的“件”和“號”，是不同的、有時重疊的概念。一個編號也許包括了很多件(頁)，也許只包括了1件。而各家著錄用語的語義不盡相同，所以最終的統計數字仍然不能確定。

所有這些敦煌、西域的吐蕃文獻，應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來研究。包括來源於敦煌和來源於新疆的文獻

的關係，英國藏品和法國藏品的關係，¹⁵國外和國內各藏館藏品之間的關係，單行佛經和大藏經的關係，吐蕃文獻和藏經洞漢文文獻的關係，和同期回鶻文、西夏文的關係；從時間序列來看，則應包括前弘期和後弘期文獻的關係，敦煌、西域和黑水城文獻的關係，碑銘、簡牘和寫本的關係，等等。而所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共同形成了我們引以自傲的悠久歷史、多彩文化。所有關係的核心則是這批藏文文獻，無論從內容、規模、形式，都是世界罕見、中國獨有的。

二、整理出版的意義

1. 歷史意義

首先，敦煌西域藏文文獻產生和記錄了一個特殊的年代。敦煌西域藏文文獻，形成於吐蕃占領敦煌時期（786—848）的前後，並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為藏語人羣所延續。

公元842年，隨着最後一代贊普朗達瑪的被殺，吐蕃王朝崩潰，進入了將近百年的混亂和黑暗時期。期間雖然在西藏的邊遠地區，“毀佛滅佛”的號令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貫徹；從衛藏地區逃逸的僧人，繼續在中心地帶以外的地區進行佛事活動；許多佛教經典被藏匿而逃過劫難。但是，從整體上來說，創建於7世紀而僅歷百餘年的年輕的藏傳佛教，畢竟經受不起這種強力的摧殘而瀕臨滅絕。到了公元11世紀時，藏族社會逐漸得到安定，佛教開始在西藏復興。寧瑪、噶舉、噶當、薩迦等派迅速發展，並開始了大規模的佛教經典的翻譯、搜集和整理，使藏傳佛教的文獻得以重建。

後來，藏傳佛教將吐蕃時期的佛教稱之為“前弘期”，而將11世紀後的佛教稱為“後弘期”。出於敦煌、西域的材料，大多屬於吐蕃佛教時期。是我們研究西藏文明史、漢藏關係及吐蕃統治時期各個方面的重要文獻。

由於“前弘期”基本文獻資料的缺失，後期的許多西藏歷史的著作，比如最為著名的《青史》、《布頓史》、《賢者喜宴》等著作，都相對缺少對於“前弘期”政教社會的記述，時時陷入浪漫的謳歌，或者神異的傳說。現代治西藏史者，也由於缺少可靠的文獻資料，經常只能以簡約而空泛的文筆來帶過“前弘期”的歷史真實。而敦煌、西域以及藏區出土的“前弘期”的史料，特別是碑銘、官私文書、簡牘、信函、契約等，是當時藏漢官方和民間的真實記錄，顯然比後期形成的即使是最經典的歷史書籍準確得多。即以王堯、陳踐先生等譯著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的各個版本的遞進研究而言，¹⁶其資料的確鑿和研究的深入，顯然是後弘期形成的史學論著無法企及的。又如圍繞“吐蕃僧諍記”專題開展的討論，由於大量運用了敦煌出土的漢藏文資料，使得其歷史真相以前所未有的明晰程度呈現在人們面前。

作為藏漢文化交流的體現，藏族學者從漢籍中翻譯了許多儒家典籍，並編纂有藏漢詞彙對照，為學習漢、藏文提供了方便。在一些重要經卷、贊頌或者童蒙識字課本中都標注了藏文音譯。藏文文獻中有不少西藏苯教或者薩滿教的寫卷，有民族、民俗日常生活的文書；尤其有大量當時流行而後弘期已經湮沒的密教典籍。這些材料對於9世紀以前藏漢等民族文化的交流滲透、藏傳佛教的早期形成、中原和印度佛教的論證、藏漢佛教文獻的互相轉譯和相互影響等許多方面，都是獨一無二的原始資料，是我們研究西藏文明史、漢藏關係及吐蕃統治時期各個方面的主要參考文獻。這些材料和後弘期流傳至今的藏文文獻既有聯繫，又有着無可替代的獨特意義。

2. 現實意義

近年來，國家十分重視藏學研究和藏學文獻的出版。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敦煌西域藏文和其他文種如回鶻文、梵文、于闐文、龜茲文、粟特文等文獻資料，更有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和深遠意義。

敦煌西域的古藏文文獻，記載了漢藏文化交流的悠久歷史。這種交流是通過戰爭與和平的形式，通過世俗和宗教的媒介，或疾風暴雨、或潤物無聲地進行的。歷史通過碑銘、簡牘、文書、寫經等等，重構了中世紀漢藏民族的緊密聯繫和文化融合，對於國家認同具有重大的意義。對於藏民族吐蕃時期開始有文字記載的史料的研究，可以充分論證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西藏和內地的在政治、文

化、經濟等多方面的雙向交流和學習，是藏漢民族關係的主旋律。

藏文文獻在現存中國各民族古籍文獻中數量僅次於漢文古籍而居第二位。英法藏藏文文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英藏敦煌藏文文獻與法藏敦煌藏文文獻互相補充、相輔相成、相映成輝，是中華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整體上說，同宗同源的材料，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只有完整的發表，才能促成、促進完整的材料駕馭。而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藏經洞的藏文文獻，和與之數量相當的漢文文獻，以及其他回鶻文、粟特文、龜茲文、于闐文等文種的材料來說，也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和相關的系統。所以，只有發表公布所有的材料，並且使得各文種的研究都達到相當的水準以資相互證明、相互溝通，敦煌和西域文獻的價值才真正能得到完整的體現。

由於種種原因，敦煌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獻，分散流布於世界各地，為完整、系統研究這些材料帶來了很多困難。歐洲和日本學者既得地利、人和便利，做了不少比較、綴合、研究的工作，在古藏文和吐蕃歷史文化研究領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佔據領先地位。中國的前輩學者很少能够親臨觀摩，或是在閱讀機上對縮微膠卷進行仔細的辨認，或是按照西方學者已經發表的編號進行比對；少數專家有機會奔走於歐洲各家藏館之間，屈辱勞頓，糾結低效，奔命於材料的采集而無暇深入學術的研究。而今以法藏、英藏材料的出版為標志的吐蕃文獻的全面出版，是繼敦煌漢文文獻之後最大宗的流失海外文獻的出版，將為中國藏學的振興和各相關學科的發展提供最直接最根本的資料；將基本終結學術研究初期的“材料學”階段，使得無數的藏學和歷史學專家，可以不出家門而伏案工作。

在全球範圍內搜尋、挖掘、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或者瀕於滅絕的西藏歷史文化資料，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獻，是重大的傳統文化保護工程，展示了我國對西藏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政策，有力反擊境外反華勢力、分裂主義分子在西藏傳統文化保護方面對我國的污蔑和不實之詞，因此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敦煌古藏文文獻的史料價值是多元的、豐富的。隨着我們對這些文獻研究的深入，其價值會以日益燦爛的面貌發掘出來。對此可以說，其意義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我們特別期盼分藏於世界各地的總量約20000件的吐蕃文獻都有機會整理出版，化身數百，不僅是藏漢先民創造輝煌文化的榮耀，也是整個中華民族對全人類歷史文化的重大貢獻。

西北民族大學建校伊始，就十分重視藏學研究和人才隊伍的培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自2005年起，西北民族大學同時和英國國家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聯絡，得到了兩國圖書館中國部負責人吳芳思（Dr.Frances Wood）和郭恩（Dr.Monique Cohen）女士的支持（此後又分別有Dr.Sam van Schaik和Dr.Nathalie Monnet具體負責此項工作）。學校調集了藏學院和歷史文化學院的研究力量，吸收了藏傳佛教界人士，組成了“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具體進行古藏文文獻的編纂工作。在前人成果的支持下，進一步開掘和準確定位，進行了更深層次、更完整的比定、編目和研究。和前輩專家到外國圖書館查看吐蕃文獻不同，作為新時期、新條件、新技術下的研究者，以藏族學者為主體的編纂人員，他們能够看到清晰的圖版，察看遺書的細節；可以利用電腦來檢索、查閱資料；可以同時調閱不同的遺書來進行比定。而最終成果是以藏文、漢文雙語定名的、完整收錄除簡單重複以外的全部藏文文獻的大型文獻資料叢書，在國內外都開創了先例。

早在2006年5月，《法藏敦煌藏文文獻》開始出版，同年9月在蘭州召開了發布會。與會的藏學研究專家，大多數是首次看到長期流失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獻的清晰圖版，並為這批文獻的完整出版前景而鼓舞。王堯先生說，這是藏學研究的里程碑；今枝由郎先生說，其意義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熱心的鼓舞。從那時開始至今，《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已經出版了1—11冊；而目前《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也開始出版。流失海外最大宗的、最重要的吐蕃時期的藏文文獻資料，將通過中國學術界、民族教育界的藏、漢專家的共同努力而得到完整出版，這是足以告慰幾代學術前輩的“千古壯觀”！¹⁷

我們的目標，是首先整理出版最大宗、最集中的法、英所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然後聯合國內其他科研教學

單位，開展散藏材料的整理工作。在當前集中精力整理出版的同時，抓住重點開展研究；並且同步做好數據庫的資料采集彙編工作。我們力爭通過發掘新材料，研究新對象，培養新人才，獲取新成果。

我們將繼續以編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獻為契機，聯絡團結更多的藏家，聯絡國內各高校、科研單位，開展區域的、專題的多種形式的合作。努力把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獻以較高的水準整理出版；同時，不失時機地搜尋更多散佚的、未公布的資料，使之化身百千，為學術研究、為民族歷史教學、為服務當代所用。

金雅聲（西北民族大學黨委書記）

趙德安（西北民族大學校長）

束錫紅（西北民族大學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所長）

- 1 按照拉露女士（M. Lalou）《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目錄》（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Fonds Pelliot Tibétain），為2216個編號；王堯主編，陳蹠、褚俊杰、王維強、熊文彬參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在《拉露目錄》基礎上重新調查了原卷和膠卷，著錄編號4450個，含3375個膠卷號。
- 2 亞歷山大·卓林（Alexander V.Zorin）著，趙大瑩、薩仁高娃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藏文古籍》，見《文津流觴》2009年第2期（總第二十六期），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部內部刊物，第36—37頁。
- 3 薩維斯基（Lev S. Savitsky）《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錄》（T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s in Collection of the Leningrad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 4 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25頁。
- 5 亞歷山大·卓林（Alexander V.Zorin）著，趙大瑩、薩仁高娃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藏文古籍》。
- 6 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160、163頁。
- 7 見中國國家圖書館IDP網頁：http://idp.nlc.gov.cn/pages/collections_ch.a4d。
- 8 黃維忠《國內藏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回顧》，第二屆海峽兩岸藏學研討會發言，北京，2010年7月，載《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3輯。
- 9 藤枝晃（Fujieda Akira）《敦煌寫本概述》（一）（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人文》（Zibun）第9號，1966年，第13~16頁。
- 10 黃文煥《河西吐蕃文書簡述》，《文物》1978年第12期，第59~63頁。黃文煥調查結果如下：敦煌縣文化館（現敦煌市博物館）：貝葉經8780件、卷軸224件；敦煌文物研究所（現敦煌研究院）：貝葉經42件、卷軸43件；酒泉縣文化館（現酒泉市博物館）：卷軸19件；張掖縣文化館（張掖市博物館）：卷軸1件；武威縣文管會（現武威市博物館）：貝葉經7件；蘭州圖書館（應為甘肅省圖書館）：貝葉經1117件，卷軸30件。
- 11 [英]散·馮·謝克（Sam van Schaik）著，楊富學、許娜譯《中國收藏的敦煌吐蕃文文獻》，譯自《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院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002年第1期，第129~139頁，譯文刊《隴右文博》2007年第2期。
- 12 馬德《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概述》，《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 13 吳其昱《臺北“中央圖書館”敦煌蕃文寫本佛經四卷考》，《敦煌學》第2輯，香港，1975年，第56~69頁。
- 14 黃維忠《國內藏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回顧》。
- 15 比如A.麥克唐納與今枝由郎編《敦煌藏文選集》（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 complét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 par A. Macdonald et Yoshiro Imaeda）。其全名作《（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藏文文獻選，并以印度事務部和大英博物館所藏文獻補充者》，已經綴合了法國、英國的部分寫本。
- 16 此書的第三版為“慶賀王堯先生八十華誕”專集，用漢藏雙語出版，更名為《敦煌古藏文文獻研究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
- 17 王國維《讀史二十首》句：“千古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

序 言

沙 木

二十世紀初，大量古文獻由西域古絲綢之路被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和瑞典的考古探測者和冒險家們帶到了歐洲。最近，中國的考古學者在該地帶還發現了更多的文獻。這些分散的文字和藝術品，記錄了西域不同時期繁榮的多種文化。它們被帶到了上述國家的博物館和圖書館。

西域文獻最大且最有名的一個貯藏地是一個密閉的圖書室，發現於敦煌寺院洞窟。文獻有卷軸裝、貝葉裝、裝訂書籍和木版多種形式，手寫，少數印刷，語言多樣，包括梵文、漢文、藏文、于闐文、西夏文和回鶻文。這些文獻時代都在藏經洞封閉的11世紀初以前。

洞內的大多數藏文文獻流散到英國、法國和俄國的國家圖書館，還剩下一部分重要的在中國甘肅。英國收藏的敦煌文獻現在倫敦國家圖書館保管，來源於探險者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生的探險隊。20世紀初，斯坦因在西域進行了四次探險，除了最後一次，每次旅行都帶回數百件物品。除了敦煌藏經洞的文獻，斯坦因在西域周圍其他遺址找到了藏文文獻。這些遺址最重要的是安得悅、米蘭和麻扎塔格、額濟納河和黑水城。

斯坦因從西域獲得的物品最初分藏在幾個不同的機構中。文獻材料給了英國博物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印度政府。到1982年，大多數文獻材料已經從英國博物館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轉移到了英國圖書館。英國博物館收集品現在主要由斯坦因帶回的圖畫和立體品組成。印度政府的材料現收藏在印度國家博物館，主要也是圖畫和立體材料。斯坦因紡織品是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從印度國家博物館長期借用的。

許多藏文文獻是松散的貝葉裝形式。當這些藏文寫卷在敦煌藏經洞被發現的時候，是和其他語言的（包括梵語、于闐語和回鶻語）寫卷捆綁在一起的。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不同語言的寫卷被分開並且放置的地方不同，以藏文為例，排架號是IOL.Tib。這些藏文散葉也包括數百個卷軸，主要是一種佛經《大乘無量壽經》的抄寫件。

比利時流亡者威利普散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員托馬斯把這些散落的藏文頁分類。那時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管理人使用最新的保護手段維護損壞的和易碎的寫卷，以紙為背襯，用絲網覆蓋。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繼承了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收藏品的英國圖書館，一直在對以前的保護進行再評估。

這些散葉已經去除了皮革裝訂和舊紙背襯，正逐漸從所有頁中去除絲網；對撕毀和易碎的頁，在必要的地方代之以最小限度的修補。因此，寫卷現今更接近它們的原始形式。

寫卷編號

上述提及的幾乎所有由斯坦因發現的藏文寫卷現在保存在英國圖書館。那些來自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寫卷，以前綴“*IOL.Tib*”編號；而那些來自英國博物館的東方收藏品，以前綴“*Or*”編號。

“IOL.Tib” 的編號更進一步分類如下：

IOL.Tib.J：敦煌藏經洞藏文寫卷。

IOL.Tib.N：不同遺址的藏文木片，特別是米蘭和麻扎塔格的。

IOL.Tib.M：不同遺址的藏文寫卷，特別是額濟納河和黑水城（斯坦因第三次探險）的。

“Or” 編號的斯坦因藏文材料包含的是：

Or.15000：不同遺址的藏文寫卷，特別是米蘭和麻扎塔格的。

Or.8210/S：敦煌的漢文手卷和片段，包括大約80號藏文文本。

Or.8211：敦煌以外的漢文和其他語言的寫卷。

Or.8212：不同語言的寫卷，一些來自敦煌。

浩繁的敦煌藏文寫卷大多數屬於IOL.Tib.J序列。該序列起初由威利普散目錄的全部編號組成，也就是IOL.Tib.J.1–765。但是由於威利普散的目錄是不完整的，許多條沒有被編號。威利普散沒給編號的寫卷（大多數是片段），由沙木在2001年編號為IOL.Tib.J，數字從766到1774。於是，最初印度事務部收藏的斯坦因敦煌藏文寫卷現在被編號為IOL.Tib.J.1–1774。

威利普散目錄涉及的寫卷多樣，其編號已經進一步區分到小數點以後的一個數字。因而，威利普散的編號310，包含一千多個《大乘無量壽經》寫卷，被細分成IOL.Tib.J.310.1 到IOL.Tib.J.310.1207。

關於這些寫卷的另一種編號方式是斯坦因的遺址編號，它們是斯坦因分配給他的全部掘獲物的代碼，這些代碼指出物品被發現的具體遺址。編號直接寫在這些物品上。敦煌發現物都被給予以字母“Ch”開頭的代碼，即是“千佛洞”（也稱莫高窟）的英文縮寫。代碼按照數字、字母和羅馬數字順序組合。藏經洞寫卷起初發現時是成捆的，這些代碼大多標識了原始包裹。

斯坦因藏文寫卷的第三種編號方式被托馬斯和其他人使用，與卷數和頁數有關，這些卷號從1到73。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最初保存這些寫卷時設定，每卷內的每一頁給定一個頁數。以後，寫卷未捆綁，放置在保留舊卷號的箱子裏。卷號分類延伸應用到新的箱子，以至於現在卷號從1到156。

編目

1951年，托馬斯出版了藏文文學文本和文書第二部分——關於中國和西域專輯，書中對一些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收藏品中的敦煌世俗材料進行了編目。最近，武內紹人又在他的著作《西域古藏文契約》研究了這部分材料。

1962年，保存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收藏品中的敦煌藏文佛教寫卷目錄出版了。該目錄是威利普散的成果，他是一戰期間逃亡在倫敦的比利時學者。除了一些編輯校訂工作外，該目錄包含了威利普散戰後返回歐洲大陸時留下來的工作成果。儘管它涉及了不少藏文佛教寫卷，但許多被遺漏了。即便如此，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傑作，帶有主題結構、索引和詞彙索引，顯示了威利普散對印度-藏傳佛教的深邃見解。

接下來的十年，在山口瑞鳳的指導下，東洋文庫編寫了一個斯坦因收集品的敦煌藏文寫卷目錄。該目錄在1977年和1988年之間出版了12冊。編目團隊有系統地進行所有材料的編目，記錄每一條的標題、開頭和結尾。他們把那些未被威利普散編目的寫卷指派了新的編號。遺憾的是，這些編號不同於英國圖書館定的“IOL.Tib.J”編號，所以這些編號僅在東洋文庫目錄自身範圍內有用。

1998年，武內紹人出版了斯坦因第二次探險所得藏文寫卷目錄，主要是來自米蘭和麻扎塔格的。武內當前正在進一步對斯坦因第二次探險所得藏文木片（也主要是來自米蘭和麻扎塔格的）以及斯坦因第三次探險所得藏文寫卷（主要是11世紀到17世紀的黑水城和額濟納河的）編目。

作為一個三年項目的成果，Jacob Dalton和沙木編寫了一個目錄，充分描寫斯坦因收集品裏藏文部分的密教寫卷。此項目得到英國藝術和人文研究理事會資助，他們認識到這材料對理解西藏金剛乘早期發展的重要以及威利普散論述這些材料的不足，這種不足威利普散欣然認可。2005年，“國際敦煌項目在線”公布了該目錄。2006

年，E.J.Brill出版了該目錄的增訂印刷版。

最後，Or.8210/S.序列中80多個藏文文本的目錄，由岩男一志、武內紹人和沙木編寫，正在準備中且很快將出版。

研究

敦煌藏文寫卷在不同的研究領域裏意義都很重大。它們是了解藏傳佛教早期發展的主要史料，包括一些論題如：被認為“正經”的典範文本的早期譯本，西藏密教的發展，佛教儀式是怎樣實踐的，佛教和佛教之前的宗教活動之間的關係。除了碑銘史料之外，這些寫卷也是藏文書面文字的最早實例，而且告訴我們更多有關藏文的發展情況。

最初，隨着20世紀40年代《吐蕃年表》和《吐蕃編年史》譯本的公布，敦煌寫卷對於研究早期西藏歷史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這兩個文本明顯早於以前看到的吐蕃歷史記載。兩者都屬於吐蕃帝國時期，都一定寫於藏經洞封閉之前的11世紀初期，並且包含了甚至更早的事件。確實是這樣的，比如說在《吐蕃年表》中，似乎利用了帝國歷史學家的年表。

隨後的研究着眼於更廣範圍的帶有歷史重要性的寫卷，包括法律文書，有關占卜的活動，官員的任命和派遣，私人個體間的契約以及私人信件和官方公文。學者們已經開始研究藏文寫卷，和其他語言如漢語、于闐語和回鶻語的寫卷齊頭並進，從而闡明了藏族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間的關係。吐蕃帝國占領的其他西域遺址（如米蘭和麻扎塔格）的藏文寫卷的研究工作也已經進行。

上一個世紀，歐洲、日本、中國和美國的學者們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經真正地革新了我們對早期西藏的歷史、風俗和宗教活動的認識。由於寫卷被保存在世界各個機構，這些成績的取得，面臨着直接翻閱寫卷的困難。但是，最近幾年來，這種情況已經開始改變。

“國際敦煌項目”(英文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簡稱“IDP”)成形於1994年，在英國圖書館建立了理事會。保存敦煌寫卷和藝術品的各個機構，渴望共同工作，憑借高優質的數碼影像技術，將起初的收藏品重聚在一起。“IDP”如今在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德國都有中心。“IDP”1997年開始寫卷的數字化，它的網站(<http://idp.bl.uk>)於1998年10月在線，允許免費進入數萬張高優質的寫卷圖像庫。“IDP”是當前同類項目規模最大和最成功的，提供數十萬張繪畫、藝術品、紡織品、寫本、歷史相片和地圖的信息，同時還有編目和原文的信息。

另一項“吐蕃文獻在線項目”(英文簡稱“OTDO”)最近也已經開展，網站(<http://otdo.aa.tufs.ac.jp>)為所有重要的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藏文歷史文本提供了轉寫。像“IDP”一樣，“OTDO”網站實際上使分離的收藏品重聚，克服了文獻的機構分割，這些文獻原本是同一個收藏地的一部分。這些項目使學者更容易接近敦煌文獻。

目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本書影印圖像，將使全套的斯坦因敦煌藏文文獻以新的形式得到利用。這將使學者們比以前更容易接觸到全部材料。憑借現今可利用的資源，我們期待更清晰地了解早期西藏的歷史和文化。

沙木 Sam van Schaik (英國圖書館“國際敦煌項目”)

(英文—中文翻譯：張秀清)

編 例

1. 本書收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歷次中亞探險所獲全部藏文收集品，主要來自敦煌、米蘭、麻扎塔格和黑水城等地。

2. 為簡省篇幅且不影響研究，對於大量重複的通行佛經，將視具體情況作“存目”處理，即不出圖版，保留編號並予以說明；對其中具有題記、寫經人署名、批校等特別內容和形式者則照常刊印。

3. 本書所收文獻的定名，由編者依據內容並參考歷史文獻和現有研究成果考訂。

本書圖版標題用藏文、漢文雙語編寫。

4. 本書按照館藏編號編排，編號情況如下：

前綴IOL.Tib編號——來自印度事務圖書館的寫卷。IOL Tib編號的進一步分類是：

IOL.Tib.J: 敦煌藏經洞藏文寫卷。

IOL.Tib.N: 不同遺址的藏文木片，特別是米蘭和麻札塔克的。

IOL.Tib.M: 不同遺址的藏文寫卷，特別是黑水河和黑水城（斯坦因第三次探險）的。

前綴 Or 編號——來自英國博物館的東方收藏品。Or.編號的進一步分類是：

Or.15000: 不同遺址的藏文寫卷，特別是米蘭和麻札塔克的。

Or.8210/S: 敦煌的漢文手卷和片段，包括大約80號藏文文本。

Or.8211: 敦煌以外的漢文和其他語言的寫卷。

Or.8212: 不同語言的寫卷，一些來自敦煌。

5. 本書圖版說明文字的含意如下：

例：英 IOL.Tib.J.VOL.3 3.大寶積經第三十妙慧童女所問經 4.一百羯摩 (101—72)

其字符意義依次為：

IOL.Tib.J ——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搜集品代號

VOL.3 —— 館藏編號；

3.大寶積經第三十妙慧童女所問經 4.一百羯摩——本卷內容的第3項和第4項及其標題或者擬題。

(101—72)——本編號文獻IOL.Tib.J.VOL.3的圖版總數和本圖版的序數，說明本號共有101幅圖版，該圖版是第72幅。

R——表示正面 (Recto)。沒有背面項目時省略。

V——表示背面 (Verso)。

6. 本書最後一冊將編製《附錄》，包括《敍錄》、《年表》、《分類目錄》、《索引》等。

二十九

ତେବୁଣ୍ଡିକା ଶାନ୍ତିକା ହରିକୁମା

ଦ୍ୱାରା ପିଣ୍ଡକଣ୍ଠା ତ୍ରିକଣ୍ଠା ତ୍ରୁଷା ପରିଶର୍କଣାକୁ

କୁର୍ତ୍ତିଦିଷେ ପାହିଦି ଶଶୀଶୁଣି କରି ଶବ୍ଦ ପାଇଲା ଶବ୍ଦରେ କରିଲା ଶବ୍ଦରେ
ଛିମା ଛିମା କରିଲା କରିଲା ପାହିଦି ଶବ୍ଦରେ କରିଲା ଶବ୍ଦରେ କରିଲା

୨. ଦ୍ଵିତୀୟ ପ୍ରକାଶକ ହାତେ କରିବାକୁ ଅନୁରୋଧ କରିଛନ୍ତି ।

ଦ୍ରୁତିକୁ ହିନ୍ଦି କୁଳା ଏବଂ ଦ୍ଵାରା ପାଇଲା କାହିଁ କାହିଁ କାହିଁ କାହିଁ କାହିଁ